

□刘献彪 陆万胜 葛桂录 任洪国 著

新时期

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

(1978—2004)

中国档案出版社

新 时 期
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
(1978—2004)

刘献彪 陆万胜 葛桂录 任洪国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 / 田小燕

封面设计 / 黎 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 / 刘献彪、陆万胜、葛桂录、
任洪国著.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7

ISBN 7-80166-514-7

I .新… II .刘…陆…葛…任… III .① 编年史②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K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3328号

书名: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

出版 / 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发行 / 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 / 山东天马旅游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 850×1168 1/32

印张 / 12.5

字数 / 335千字

版次 /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 1—3000

定价 / 42.00元

序 言

陈 惇

今年,2005年,对中国比较文学来讲,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20年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标志着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在神州大地崛起。那时,大家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欢度这个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同时也不能不意识到前程的艰难。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相当陌生的一门学科,是一门要求比较高、难度比较大的学科,而且他刚刚摆脱“伪学科”的帽子,是在没有上上下下的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人们自发地搞起来的,因此它能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住脚跟生根开花?能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而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些都是未知数。道路需要自己来开辟,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如今,20年过去了,有道是:20年后又一条好汉。那么,中国比较文学是不是成了一条好汉呢?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年8月,我们又重返深圳,在这里召开一次新的学术会议,就想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次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目的是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明确方向,推动我们的事业健康地持久地向前发展。我相信,它将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新的起点。

要总结,首先要清点事实,梳理过程,看一看这20多年间,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做了哪些事情,有什么成绩,有什么问题。正是这个时候,刘献彪教授、陆万胜教授、葛桂录教授、任洪国老师等四位学

者,推出了《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一书。它以编年史的方式,展示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如何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学者如何把这样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移植到本国的土地上,如何以自己优异的学术业绩向世人证实了它的价值,如何打通了它与国际学术界的通道并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又如何通过艰苦的努力争取到它在国家的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上的合法地位。20年的成绩是肯定的,值得珍惜的,同时问题和遗憾也是存在的,不可忽视的。比如,引进较多而创新乏力,学科本身的身份不清和界限模糊带来的“泛化”现象等等。不过,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对待,认真总结,它们就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仿佛是为我们的20年总结提供了一份清单。有了这样一份清单,我们的总结工作就有了一个查考的依据,所以,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另外,这本书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现在,比较文学已经成为全国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而且有了几十个硕士点和十几个博士点。摊子已经铺开,而且铺得相当快,相当大,相形之下,我们的准备工作却远远跟不上。拿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来说,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规范化的教学方案,连起码的课程设置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一些重要的必修课程,由于无人过问而付诸阙如。在这里,我想特地谈谈学科史的问题。国际的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史,对于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生来讲,应该是他们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读过一些比较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是不够的),不然,他们很难说是比较文学的专门人才。有些研究生写的学位论文选题缺乏创意,文章中不交代课题史,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们缺乏学科史的基本常识,不懂得学科史的重要性。然而,问题的根子不在学生而在于我们比较文学界本身就缺乏这方面的专家,少有这方面的著作,在于我们对学科史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为了搞好研究生培养工作,提高研究生的质量,我们有必要加强学科史的研究。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需要付出长期的

艰苦的劳动。全面的、完整地收集史料,编写编年史、大事记,可以说是这项工作的基础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和有关著作的编写,创造了良好条件。这是刘教授他们为比较文学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为此,我们由衷地感谢刘教授和他的伙伴们。我们也期待着新的学科史著作早日诞生。

2005年6月

前 言

乐黛云

中国比较文学是在中国破土而出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既不是舶来之物,也不是古已有之,它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它适于推介外国文学,特别是翻译外国小说,并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重新认识自己,以寻求发展新路,它的根基始终是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学传统。20 世纪第一个十年,林纾、王国维、鲁迅的著作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比较文学自存在以来,就是和关切人类生活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的。1985 年,由 36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玛(Douwe Fokkema),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艾德礼(Owen Aldridg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厄尔·迈纳,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雪弗列(Yves Chevrel),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等 14 名外国著名学者和多名港台著名学者都参加了大会,与此同时,我们还举办了由他们担任主讲、并由 200 余名国内青年教师参加的比较文学讲习班,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讨论会按当年季羨林、杨周翰、李赋宁等老教授所商订的七个专题进行,即“比较文学方法论”、“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诗学与美学”、“东方比较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

较研究”、“中西神话比较研究”、“总体文学与科际整合”等,大会按照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讨论者大可以和而不同,不必同声一致”的原则进行,这个原则一直贯彻到如今。

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文化,二是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在中国本地破土而出的、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体现,它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比较文学的出现是一定社会和物质条件以及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现(匈牙利),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的出版(英国)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正式建立(法国)为标志的。经过数十年法国关于文学传播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关于无直接关联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已有百年历史。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并不是这一历史的直接分支,它虽出现在同样的时代语境,受着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塑形性影响,但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20世纪伊始,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

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就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于是,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并在晚年哀叹“平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清末民初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苏曼殊、胡怀琛、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

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出现于课堂里,是一种纯学术现象,一种“学院现象”。而20世纪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也不是在学院中产生,它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的重大意义与价值。

这是第一点不同。这第一点不同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与欧洲比较文学的第二点不同,那就是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

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对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在相通性之外,更强调强烈的差异性和对比性。从这一点看,初期欧洲比较文学的重心在“认同”,不在差异的“比较”,而初期中国比较文学的重心却在差异的“比较”而不在“认同”。

这种发生和发展的不同,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之间的另一深刻的差异,那就是欧洲比较文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这一特定的、同质文化领域的文学内部进行的,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一种区域性内部的比较文学;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一开始就跨越了区域界限,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诚然,欧洲人靠着新大陆的发现、奴隶贸易、资本的输出和殖民地的建立,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比中国人更早具备了世界视野,但从文学史上看,当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时候,其基本宗旨是清理和研究欧洲内部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

直到20世纪30年代时,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中将法国的比较文学实践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的时候,他的视野仍然仅囿于欧洲文学之内。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学科界定为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只有在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才能进行:超出欧洲之外,则因当时文学交流与传播的事实链条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中,还不能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且,从当时法国人及欧洲各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语言装备来看,通晓欧洲之外的语言、并具备文学研究能力的学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而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欧洲文学之外,对他们来说即使有心,也是无力,况且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使其他文化变得跟他们自己的文化一样,如罗力耶在《比较文学史》一书中所追求的,那就使欧洲的比较文学更难成为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比较文学了。这种情形到了50年代,由于平行研究的蓬勃发展和某些非欧美血统的学者(特别是俄国、日本和印度的学者)的加入,为西方比较文学添加了更多世界

性因素,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特别是增添了并无直接关联的、超越时空的主题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但由于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的局限和语言本身的限制,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在20世纪初发轫,20年代后作为一种学科开始孕育,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进程。尽管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大陆地区的比较文学在60至70年代处于一种沉潜状态,但台湾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却在这一期间率先繁荣起来。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术界,压抑了多年的学术热情和创造力,向井喷一样迸发出来。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最具开放性、先锋性的学科之一,得到了迅速的复兴和迅猛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在此时的崛起,具有其重大历史意义。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逐步进入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共存的要求与帝国文化霸权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人们急需相互理解、沟通和对话,文学的任务首先是研究人,作为跨文化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有着独特的作用。

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因此,当代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特征,首先是有关不同文化体系中,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动”。

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第三阶段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者,首先是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

实行者,而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其次,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第三,长期以来,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日本、波斯等国已有过深远的文化交往;近百年来,中国人更是对外国文化和外国语言勤奋学习,不断积累(包括派送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使得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这就使得中国比较文学有可能在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这一新的时代高度,置身于建构新的比较文学的精髓,对各国比较文学的派别和成果兼收并蓄。30年代初,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都是在出版后不久就被名家翻译成中文的。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包括俄国、日本、印度、韩国、巴西)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分析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中国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没有向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如此热心的。最后,还应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文史哲不分,琴棋书画、舞蹈、戏剧相通,为跨学科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方位性的各种可能。

总之,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既拥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具有明显的世界性和前沿性。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它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有突破了法国比较文学与美国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能真正致力于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深入导向崭新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阶段的法国文学,开创了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和影响研究。在这方面,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历史。这不仅是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且也是研究的必需。举例来说,中国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

在宗教与文学的杂糅中,古人很难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羨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对全世界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50年代后,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二阶段的美国比较文学,突破了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 Romeo and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以及《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为代表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研究之楷模。当然,在发展中,有波折,也有涸流,例如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

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作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前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 80 年代后,平行研究的兴起,也出现了一些“x 比 y”式的牵强附会的比附现象,在受到季羨林等先生的批评后,中国的平行研究才有了更好的发展。“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也曾受到一些质疑,有人提出“它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他学科的借鉴?”其实,这两者的结合与相互为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有人认为只有当“跨学科”同时也是“跨文化”时,才能视为比较文学等等。但“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前进,1989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初步展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这方面的成绩,杨周翰教授在为这本书写的序中特别指出:“我们需要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跨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此外,还应提到世纪之初,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以西洋的术语概念来解读和阐释《红楼梦》和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以及宋元戏曲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作品相契合,虽然没有更多直接比较,但与表层的直接比较相对而言,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地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并由此开中国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之先河。以 A 文化的文学理论阐释 B 文化的文学作品,又以 B 文化的文学理论阐释 A 文化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双向阐发在中国的跨文化文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至有些台湾学者提出阐发研究就是“中国学派”的特色。

总之,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在自己独特的研究中试图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独到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色,为世界比较文学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沿着上述发展路径,又开创了一些新的领域,特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学科理论的新探索。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结合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对比较文学的观念有所推进。例如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与互补观念;强调差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并通过文学,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建立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交流的基本理论;探索东西方文学对话的话语机制与方法等等。

第二,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的硕果,是“中西神话比较研究”的延伸,也是近2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最具活力的一个新领域。自1991年至今,“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共800余万字相继出版,包括对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史记、说文解字、中庸等上古经典的人类学现代诠释,特别是最近出版的第八种——《山海经的文化追寻》,在世界文化语境的参照下,对这部最神奇难解的上古经典作了极有创见的文学和文化解读。

第三,翻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不仅有着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而且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数和翻译作品的数量在全世界都遥遥领先。据统计,20世纪的最初10年,文学翻译作品占我国全部文学出版物的五分之四。今天,各类翻译作品也占到了我国全部出版物的将近二分之一。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翻译文学不可能脱离译者自己的文学再创造而存在,翻译家的责任不仅是有创造性地再现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处,创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不仅传输外来语言而且发展本土语言。因此,译成中文的翻译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文学史应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分枝,这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共识。

第四,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Diaspora)的相遇。近年来过

去的华人文学研究不仅包容了海外作者用华文写的作品,而且包容了海外华人及其后裔用不同语言写的文学作品。这种研究的重点在于观察和分析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并进一步以这些作品为核心展开异国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诠释。近几年来,这种研究迅速汇入世界性的以漂泊流浪的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流散文学”的探讨。这方面的学者不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流散写作理论,而且通过总结中国流散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直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有效的对话。中国在全世界的移民为数众多,历史悠久,这种研究必将为未来的世界文学史的重写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第五,关于文学关系的清理。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从历史上看,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近年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 20 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即将出版的 15 卷《中国现代作家在古今中西文化坐标上》大型丛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10 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无疑是 20 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季羨林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印度、波斯、日本、朝鲜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历史悠久的积累,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学理论体系,可惜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往往“知西而不知东”,这是很大的遗憾。近年来,关于东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可喜的进展。

第六,关于教学教材建设,尤其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作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大学都已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设有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大学已达 50 余所,比较文学在许多师范大学特别受到关注,全国高校的比较文学系已在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创立,他们的毕业生逐年把比较文学所贯穿的人文精神和国际精神带到了中学。潍坊学院还出版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倡导比较文学走向中学,编写中学比较文学教

材。全国中外文的比较文学刊物已出版 8 种,北京大学和上海师大还建立了大型国际性比较文学网站和数据库。目前,中国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已达 100 余人,各地的省级比较文学都有自己的活动,最红火的是四川、上海、江苏、广东和山东,另外,陕西、贵州、湖南、吉林等地方学会也都承办过全国的比较文学年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所属的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文学人类学学会、传记文学研究会、后现代研究中心等也都在积极开展工作。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比较文学教学研讨会于 2004 年 8 月 15 日在威海召开。

第七,关于东方地区文学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有了新的可喜成绩。1996、1998 年相继出版的《东方文论选》(曹顺庆编)、《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卷》(曹顺庆著)涵盖了上述各个东方民族的重要文学理论;《东方文学交流史》(孟昭毅著)分章论述了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西亚和南亚各地区的文学关系;北京大学严绍璦教授以中日韩三国文学为基础,开辟了文学发生学的新视野,取得了重要成绩。刚刚出版的《东亚文学导论》从中日韩文学复杂的多边关系出发,整体地研究了东亚文学所隐含的多样性和相似性,是引导学生关注东方文学的一部好教材。

第八,关于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新进展 对中国比较文学来说,文学形象学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在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中,北京大学都主持了有关中西文学性相互看互识的讨论。2000 年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多元之美”世纪比较文学大会特别突出了文学形象学的主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出版的 8 卷本《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周宁编著)。这部巨著相当全面地汇集了有史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所塑造的各色中国形象,为形象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比较诗学、跨文化生态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也都创造了可观的成绩。当然,以上所说的都只能是挂一漏万,难以概括全局。